

啓功

對我說



陳榮琚

編著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陈荣琚
编著

启功 对我说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功对我说 / 陈荣琚编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200-12181-0

I. ①启… II. ①陈… III. ①启功 (1912-2005)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6895 号

启功对我说

QIGONG DUI WO SHUO

陈荣琚 编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04 千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2181-0

定价: 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衰荣有痕付刍狗 宠辱无惊希正鹄”

——写在《启功对我说》前面的话

夏 旻

为陈荣琚先生这本书作序，我实在不够资格。作为晚辈后学，对于两位先生的书画艺术造诣和为人为学之道，我唯可仰慕景从。承蒙陈先生的充分信任和再三鼓励，我斗胆写就以下这些并不能称作书序的文字，敬请读者方家教正。

往事历历 如沐春风

回想起来，从第一次拜访启功先生并受业于陈荣琚先生，到现在已历时 28 个春秋。1987 年夏天，我从地处偏僻的晋西北五寨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师范大学。9 月开学伊始，我就兴冲冲地抱着一大卷书法习作，戴上校徽、揣着崭新的学生证去启先生家里请教。当年启功先生住在北师大校园中部的

“小红楼”。那是北师大资深教授的住所，在绿树掩映中有几栋红色砖墙二层小楼，被学校师生亲切地赋予如此美称。见面那天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启先生并没有逐走我这个不速之客，而是耐心细致地逐条给予指点。他说：“你现在写的字看着顺溜，能有想法，像一首儿歌，可是真正的好作品应该内涵丰富，像一首交响乐。年轻人学书法一定要用心学习临摹古帖，汲取古人的精华。”我那时只知道二王、欧颜柳赵、苏黄米蔡等，而且也是一知半解。看到启先生的桌子上展开放着一本字帖，旁边还有几张写满毛笔字的旧报纸，显然是先生正在临帖。但我没见过这本字帖，似乎没法将其归入上述哪家。我就问，您的字写得这么好，还要临帖？他说这是明代一位书家的作品，很好。启先生又说，古人写的东西经过千百年大浪淘沙，能够流传下来的大多是精华。告辞时启先生还一直送到门外，边打恭作揖边说欢迎再来，这让我不知所措。后来我又去过几次小红楼，启先生总是循循善诱、勉励有加。28年过去了，朝云暮雨，冬去春来，我寓居京城，经历了许多世事人情，才知道天地之大、品类之盛。当年因为自己年轻无知，再加上求学心切，以至于烦扰先生正常作息，耽误先生宝贵时间。每当想起这些情景，不禁汗颜。

后来，陈荣琚先生开始给我们讲书法课，地点在北师大的新一教室。这座简陋的大教室曾经见证过许多著名学者的精彩讲座，近些年也已经被拆除并建了新楼。早在1984年，经启功先生提名，陈先生就开始为北师大本科生教授书法，

深受学生欢迎。陈先生用大号毛笔蘸着清水在黑板上一边书写示范、一边认真讲解的情形，仿佛如昨。他讲课时语调沉稳，有板有眼，偶尔结合讲课内容不动声色地开一句玩笑，等同学们心领神会发出笑声的时候，他的笑容才会浮现在脸上。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解颜柳楷书的结字和运笔，告诉我们只要多读、多想、多记，坚持不懈地心追、意临、手摹，法书中的精华就会自然融汇到自己笔下。记得那年冬天天气很冷，书法课又往往安排在晚上。每次到师大授课，陈先生都是穿着一件半旧羽绒服，骑着一辆半旧自行车。课后，同学们还纷纷举着自己临摹古帖的作业请陈先生给予指导。陈先生总是能够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即使学生在学书中有不到位的地方，他也从不直接批评，而是耐心细致地从正面进行鼓励引导。他总说这个方法是启先生教给的。每当上完书法课，我和同学们目送陈先生顶着凛冽寒风蹬车离开北师大校园的时候，经常是晚上10点多了。那时我们把启功先生主编的《书法概论》奉为学书圭臬，陈先生就是这本书的编委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在这之前，启先生还推荐陈先生从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有关工作。1983年底，中国书协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书法名家系列讲座，陈先生专题讲解“颜真卿楷书”和“柳公权楷书”。在启先生和黄苗子先生的鼓励支持下，陈先生精心准备了授课内容。节目面向全国观众播出后，受到书法界的广泛好评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那次举办系列讲座的还有启功、黄苗子、沈鹏、康殷、欧阳中石、夏湘平等书画名家。

自从陈先生开始教我们书法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启先生家里拜访过。这可能缘于当时那点儿难得的敬畏之心和知足之意，觉得有陈先生教我就足矣，倘若再去烦扰启先生，自己于心不安。当然，这些事情我始终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自然也没有跟陈先生提起。这两年间因为讨论书稿，终于跟陈先生坦陈这桩往事，彼此不禁感慨万端。虽然再没有去过启先生家里，但是读书期间在北师大书法学社每年组织的笔会上，或者是学校举办的有关活动上，我还是有幸多次聆听启先生的现场讲解并欣赏他临池挥毫的雅兴。2000年前后我两次回母校参加有关学术活动，又见到启功先生，遗憾的是先生年事已高，不能再长时间站在那里写字了，我只能默默地记录先生的发言，并用相机采撷先生的音容笑貌。我资质愚弱，加上这些年俗务缠身，荒废了原本就肤浅的书业，实在对不起当年启先生对我这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的礼遇，也对不起陈先生多年来对我的言传身教。

陈先生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语言朴实、叙事平实，一如他敦厚诚朴的为人处世态度。全书没有华丽婉转的辞藻和跌宕起伏的故事，却详尽记录了两代人跨越31个春秋，在历经人生逆顺转换中交往、交情、交心的一幕幕往事。28年来，不管是在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还是在陈先生任教的北京电影学院，不管是陈先生当年家住新街口外大街，还是后来他定居育新花园小区，我每年都找机会前往拜访，而且每隔一段时间还电话长叙。几乎每次谈话，陈先生的话题都离不开启功先生。这本书里的大部分内容，甚至其中许多细节，

陈先生都数次跟我提起。我还有幸认真拜读他多年来详细记录同启功先生交往的日记。那本厚厚的日记已经微微发黄，仿佛散发着岁月酝酿的缕缕陈香。即使如此了解陈先生，我再仔细研读他的这本新作，依然颇有新得。

人生就是一部书。启功先生无疑是一部大书，书中丰富内涵值得我们后辈学人仔细品读、消化、吸收。文字是每个人阅历、情感、智慧的写照，这本《启功对我说》就是陈先生与启先生在31年的交往中肝胆相照、气韵互通、教学相长的见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早已年过不惑，似乎积累了一些人生体验，因此试图以自己浅陋的学识来感悟启先生和陈先生两代学人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追求，体会他们如何为学、为人、为师、为生。

诗言其志 书抒其心

人生而平等，这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可是具体到每个人，他一出生可能就跟另一个人完全不同，譬如他的智力发育、健康状况、家庭背景，以及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至于每个人此后一生的际遇，那就更加不同，就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启功先生的一生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命运紧紧镶嵌在一起。103年前，神州大地正经历沧桑巨变，启功先生就在那个时候诞生了。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刚刚爆发辛亥革命，长达267年的清王朝连同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骤然覆灭。

启先生虽“贵”为帝胄，但一出生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大清国的子民一点也沾不上边。然而这却为他后来的坎坷经历埋下了伏笔。而且还不止于此，启先生1岁丧父，视他如掌上明珠并且对他悉心启蒙的祖父也在他10岁那年撒手人寰。启先生在母亲和姑姑培养以及祖辈朋友接济下长大成人。因此他的命运既与国运共沉浮，更与家境紧相连。启先生幼年和少年时代家境败落，弱冠之年幸承陈垣先生三次大力举荐得以入职辅仁大学，而立之年书艺画作即受京城同仁推重，但是在不惑之年就被打成右派，后遇十年浩劫被时代洪流裹挟并屡遭厄运，晚年又被世人以国学大家、书坛巨擘相称誉，声名日隆，近乎洛阳纸贵。门可罗雀与门庭若市，革命与共和，乱与治，衰与荣，失与得，辱与宠，愁苦与欣喜，90多年间，酸甜苦辣，杂陈五味，在他的身心上经过了不止一个轮回。启先生在一首自作诗中曾经写道：“绝似食橄榄，回甘历微苦。诗境与人生，大约全如许。”剧烈变革的年代、命运多舛的家世、阴晴圆缺的经历、饱读诗书的感悟，以及北京城里上演的一幕幕悲剧喜剧正剧闹剧，让启先生体验了许许多多的无奈、疑惧、孤寂、悲悯、彷徨，也练就了他坚忍持重、达观自省、慎独保身、知恩报恩、惜缘敬人的性格。

记得在十多年前，陈先生有一次给我看他珍藏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背面有启先生用铅笔写的一副自撰联：“嬉笑之怒胜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这幅对联作于1983年冬，是当时启先生在跟陈先生聊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时写下的。这无疑是启先生内心感受的真实写照。启先生晚年曾

作诗云：“衰荣有痕付刍狗，宠辱无惊希正鹄。”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在祭祀时是很受人们重视的祭品，但过后即弃，后来被比喻为过眼烟云的事物；正鹄，在古时候指箭靶的中心，引申为正确的目标。这句话意指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能随时抛弃荣辱，真正做到去留无意、宠辱不惊，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多年来，启先生总是把诚意和善意毫无保留地洒向后学、交与友人，即使对某些人、事、物的看法与旁人存异，也大而化之、一笑了之。面对纷繁世事，他不是不明白，但并不急于说出来；即使有想法有看法必须说，也要使用“春秋笔法”。当然在涉及学问原则和民族大义上，他一直秉持鲜明的立场，晚年尤其如此。陈先生这本书里也有若干典型事例可以佐证，在此不再赘言。这无疑是中庸观念在启先生身上的体现。宗白华说：“中庸之道不是庸俗一流，并不是依违两可、苟且折中，乃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毅力，综合的意志，力求取法乎上，圆满地实现个性中的一切而得和谐。所以中庸是‘善的极峰’，而不是善与恶的中间物。”《礼记·中庸》也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其实，慎独并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有为有不为，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启先生有一副书作“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也是表达了自己对方正廉直和至善尽美的孜孜追求。

启功先生收藏有友人为他刻的一枚印章“启予手”，散见

于他的书法作品中。这是《论语·泰伯》中曾子说的话。曾参晚年，觉得快要不行了，就让弟子来到自己的床前，说道：“启予手！启予足！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令而后，吾知免夫！”这是中国历史上优秀知识分子谨慎做事而又坦诚为人、注重小节而又深明大义的人生哲学，它像植入民族文化精髓的基因，一点一滴在后来者身上生根发芽。这虽然为一些激进或激愤的朋友所不解甚至不屑，但是许许多多的历史经验证明，心存此念，“三省吾身”，知行合一，既可独善其身，也可兼济天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20世纪90年代，每次前往陈先生家里拜访，我都要在启先生写的这幅对联前驻足观赏良久。这幅作品纸面已变旧泛黄，然而其中依稀散发着经年不变、历久弥新的精神气息。张岱年先生曾引用《易经》中的这句话，把中华民族的精神总结概括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理想的境界如是，完美的人生亦若此。一个团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这样。真正强大的影响力不仅来源于物质财富、高楼大厦等硬实力，更来源于思想、精神、文化的穿透力和感召力。

“仁者寿”，这是启先生晚年写过数次的大幅作品，笔触灵动刚正，结体稳健高古，章法精巧天成，寄托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其中核心就是“仁”，其他四个字围绕“仁”依次展开。我认为，缺乏“仁”的“义”是江湖义气，缺乏“仁”的“礼”是形式主义，缺乏“仁”的“智”是小聪

明，缺乏“仁”的“信”是善恶不分。“寿”，我想启先生在这里既指年高寿昌，更寓意功业圆满、精神长久。《说文》曰：“寿，久也。”庄子也说：“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寿也。”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其实一个人同样也是一个宇宙。人若有仁爱、有包容、有创造，“独立而不改”，肉体即使幻化，精神依然可以“周行而不殆”。

诗言其志，书抒其心，启功先生的诗书画作何尝不是如此。

潜心向学 大家要津

从古到今，可能成为千年老店的只有两类机构，一为庙宇教堂，一为经典学校。不管是古时候的封建王朝，还是当今显赫一时的商业帝国，都难与这两类机构比肩。历史已经证明，历史正在证明，历史也必将证明，不管是至高无上的权势，还是无孔不入的资本，都难以战胜信念和信仰、科学和真理的力量。这也可能就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动物界最为重要的特征。人固然不能盲从、不能迷信，但总不能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的人是面目可憎的人，什么都不信的民族是令人可怕、也没有前途的民族。

启功先生毕生的信仰和价值追求给人以许多启示。他当年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时曾经给同学留下“言语诙谐而恣肆，举止倜傥而乖僻”的印象，这是1931年《汇文年刊》里一篇文章中的描述，在今看来实为年少时的童真童趣。是

什么时候、什么机缘让他磨去了少年率性，修炼得敦厚持重？其中缘由似乎只能从庙宇、学校和典籍中找寻。在家人的关心下，幼年启功在雍和宫按照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正式皈依佛教。从小秉承家学，少年启功和青年启功有幸结识当时京城诸多知名艺术家、诗人、学者，比如贾羲民、戴姜福、溥心畲、齐白石、张伯英、吴镜汀、沈尹默，并在其中一些学问大家门下正式拜师。后来由傅增湘先生热心介绍、陈垣老先生精心提携，青年启功最终从事了大学教师这个职业。这一系列主动抑或被动的选择，让启功先生的一生同寺庙和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冥冥之中成就了他的一生的信仰和学问。

启功先生属爱新觉罗家族“启”字辈。身为清王朝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启先生不愿夸耀“爱新觉罗”这个姓氏，甚至很避讳所谓“皇室祖荫”，因为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辞去皇室封爵而通过科考进入翰林的。启先生曾经说过：“‘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康雍乾三代虽然号称盛世，但就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来说，这一百余年的荣耀充其量也就是落日的辉煌。当时工业革命的足音已经打破宇宙中这个蓝色星球的宁静，世界大潮浩浩荡荡、一日千里，大清王朝黯然落幕、灰飞烟灭是历史的必然。启先生曾经在自作诗中写道：“改柯易叶寻常事，要看青青雨后枝。”意为改朝换代并不可怕，它正是历史发展的

动力。他也曾写道：“莫问临芳当日事”，意指旧的落后的东西并没必要去留恋它，新生活总要代替旧生活，新事物总要胜过旧事物，时代和个人都要与时俱进。

启先生生于民国初年，作为一个没落皇室的后裔，并没有享受过什么祖荫，但这依然会使人有意无意地给他打上旧时代的烙印。“爱新觉罗”让他无比尴尬但又无可奈何。无疑，这样的身世，使他在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人生选择不可能加入当时的民国政府成为达官显贵，更不可能利用所谓社会关系把自己打造成商贾巨富，尽管他在汇文中学读书时也曾经在家人要求下短暂选修过商科。但是他“无能逐世，又不可同流合污”，只能勤奋向学，只能反求诸己。启先生后来给自己的书斋起名“坚净居”，自号“坚净翁”，取意他珍藏的一方康熙老砚铭文“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其实“坚石、净水”中何尝没有投射出“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法自然”“上善若水”的治学方法和人生哲理！

《论语·宪问》记载，孔子有一次很有感慨地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按照荀子的说法，所谓“为己之学”，就是“学”要落实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中，“学”不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更重要的是在于安身立命并且不断完善自己的人生；而“为人之学”的“学”则只是“入乎耳，出乎口”，听听说说而已，这样的“学”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并不是把追求真知当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在这一点上，启先生真正做到了“古之学者”。

前边提到，启先生的家世虽然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烦扰，

但是他的家人尤其他的祖父是清末翰林，毕竟经过传统文化熏陶，而且有许多同道中人和高朋益友。因此，少年启功也就得到了比同龄人更多的接触当时学界和书画界大家、博览遍赏古今名作的机会。他十几岁开始就跟随贾羲民泡在故宫书画馆和琉璃厂一带的书画店，聆听各路专家鉴书赏画，遍淘古旧图书，并可随时接受老师的点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先生无疑是幸运的，这使得他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很高的治学和艺术起点上，也就是老北京所谓“见过大”。“文革”后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启先生来说更是“如鱼得水”。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仁珪估计，启先生一生经眼的古书画当以十万件计。古人云：“观千剑而后识器。”启先生晚年用“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来鼓励学生要研究名家作品，要取法乎上而内化，其实这也是他的治学经验和人生感悟。书家林岫在《书法》2012年第8期撰文回忆，启先生执掌中国书协时提倡弘扬“三气”，指有了“文气、正气”，才能创作出富有“大气”的作品。其实这“三气”是相互贯通的，是为学做人、绘画作书之三原色，是进德修业之基本功。

在我们的史书上，记载着太多的纷争，争权、争名、争利、争色。纷争的结果，要么当下就两败俱伤，要么为日后埋下祸根。曹操在《蒿里行》中对东汉末年军阀争霸曾经有过非常形象的描述：“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然而似乎“争”知识、“争”学问并不曾带来多少麻烦，反倒使自己安贫乐道、独善其身，并且成就一世功名。汉室倾颓、三国纷

争时期，钟繇独创楷书，影响后世，成就了中国书法史乃至上艺术史的一座里程碑。元代战乱不断、汉人深受压抑时期，黄公望避祸神隐，寄情于真意山水，才造就了让世人仰慕的《富春山居图》。启功先生一生耳闻历史上诸多纷争、目睹现实中诸多纷扰，必然比普通人更能洞悉其中深意。早在青年时期，他就在陈垣老先生的启发下谢绝了时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的邀任而坚守杏坛。中年屡遭厄运，但隐忍持重，不改初衷。即使在晚年声名显赫并被政府和社会授予许多职务和称号时，他依然保持高度清醒，并且对自己看重的朋友也有数次善意提醒，说千万不要趋炎附势，而要远离纷争。启先生在《古诗二十首》中曾经写道：“吾降壬子年，今第七十九。年年甘与苦，何必逐一剖。平生称大幸，衣食不断有。可耻尚多贪，朝夕两杯酒。”不争权财争学问，不争一时争千秋，广采博览、取精用弘，最终成就了名扬四海、令人肃然起敬的一代学界名宿。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这是苏轼描述的理想境界，常人难至。客观来说，启先生似乎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但这并无遗憾，因为他毕竟在广袤的学问中保持了内心的宁静，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获得了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广泛认可。启先生精研各种学问，包括文学、文献学、文物学、小学、史学、民俗学、红学、佛学等，同时又精通书法、绘画。“庞杂寡要，无家可成焉”，这是启先生自谦；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不失为成就学问大家之要津。

许身桃李 下自成蹊

一千二百多年前韩愈的著名论断，将“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经典地定格在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上。从此以后，关于师道之说似乎无人能出其右。后来有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之升华，高度当然无与伦比，但是显然可操作性不够。

启功先生当了70年大学老师，前20年在辅仁大学，后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长期的教学实践，无疑使他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内涵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陈荣琚先生1964年从中国戏曲学院美术系毕业即留校从教，后来在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他多年来用心教书育人、潜心习书作画，现在年逾古稀仍登台授课、临池不辍。陈先生与启先生之间共同的教师职业和艺术追求，使得这本书更具有教育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书中详细记录了启功先生在书画研习、诗词创作、文物鉴定乃至谈古论今、因应时事、为人处事等诸多方面，对后辈学人倾心施教的桩桩件件往事。仔细阅读这些文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当年我们住的北师大宿舍楼前“刘和珍纪念碑”上的碑文，行政主楼前面广场上“一二·九”纪念碑的题字，学校大会议室悬挂的巨幅红竹，都出自启功先生笔下，甚至校园的餐厅也由启先生题写为“乐群餐厅”。“乐群”出自《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作为餐厅名，先生对后学期望之殷切可